

“数字劳动”的异化与解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阐释

夏宛廷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 辽阳 111000

摘要：本文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重探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与剩余价值学说，对“数字劳动”这一新型劳动形态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指出，平台经济与零工经济中的数字劳动，并非对马克思时代工厂劳动的简单替代，而是资本逻辑在时空维度上的深度拓展与异化形式的精致化演进。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廓清“数字劳动”的内涵，辨析其与传统生产性劳动、非物质劳动的关系；进而，以马克思异化劳动的四个维度为分析框架，系统揭示数字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以及他者关系的全面异化，并剖析算法管理、数据商品化、情感剥削等新型控制与剥削机制；最后，论文批判性审视了“数字自由”的意识形态幻象，并尝试在马克思解放理论的视域下，探讨数字时代劳动解放与技术民主化的可能路径。本研究认为，对数字劳动的批判，本质是对人之主体性在数字时代陷落的哲学救赎，也是对一种更具包容性与解放性的未来生产关系的理论呼唤。

关键词：数字劳动；异化；算法剥削；劳动解放

引言：

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平台、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把全球生产、流通和消费图景重新塑造，引发了零工经济等模式以及“数字劳动”形态的诞生，网民做着浏览创作的事、骑手奔波在路上等，携手打造出庞大且隐蔽的数字劳动群体。其时空的弹性化表现、就业的自主化表现契合技术乌托邦叙事，但劳资争端、算法“霸权”、“工作过劳”等问题屡屡发生，迫使我们去探究其深层本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1]，以及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工具，也是把握数字时代资本统治新形式、探寻人类解放新途径的迫切需要，本文聚焦的核心问题：数字资本主义模式下劳动异化怎样演变？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框架发挥作用揭示数据与算法背后的剥削逻辑？当“无工厂剥削”普遍出现，怎样推进劳动解放这一命题？

一、理论回溯与概念廓清

本章旨在搭建全文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重述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办法确立批判坐标，接着在当代背景下梳理并界定“数字劳动”核心范畴，说明其内涵与范畴，为后续批判分析工作打好基础。

（一）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并非仅是对19世纪工厂制苦难的现象描述，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类生存论困境的深刻哲学-经济学剖析。异化(Entfremdung)揭示了主体活动的产物反过来成为支配、奴役主体的异己力量的辩证悖论。

1. 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物的世界的增殖与人的世界的贬值

劳动者投入生命所生产的商品，一旦被创造出来，便不再属于劳动者，而是作为独立于其创造者的客体，归属于资本。产品不仅与劳动者相分离，更成为了一种异己的、统治性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2]。”产品作为一种外在的、敌对的力量与劳动者相对立，其积累意味着劳动者自身价值的相对丧失，劳动产品成为反过来支配劳动者的“商品拜物教”载体。

2. 劳动者与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活动本身的否定性

异化不仅存在于结果(产品)中，更嵌入在活动(劳动过程)内部。劳动对工人而言是“外在的”，不属于其本质。因此，在工作中，工人存在不适感与压抑感，

在其认知中,唯有运用进食、饮水、生殖等动物本能时,方能感知自由活动的状态;而在发挥人类特有机能的过程中,却认为自身与动物无异。劳动从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沦为了被迫的、仅仅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进行的自我牺牲与折磨。劳动者在劳动中否定了自己,而非肯定自己。

3. 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自由自觉活动的丧失

马克思曾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3]。”这一维度将批判引向哲学人类学的高度。马克思认为,人之为人的“类特性”恰恰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4]”。然而,异化劳动将这种体现人的本质的自由活动,贬低为仅仅维持个人肉体生存的手段。当劳动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沦为谋生的工具,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便被模糊了。

4. 人同人相异化:社会关系的对抗性。

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5]。”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这直接表现为劳资关系的根本对立。工人通过劳动生产出的、统治着他的异己力量,不仅是有形的商品,更是站在商品背后、占有这些商品的资本家。因此,异化劳动生产出了不劳动的资本家对这一劳动及其产品的关系,生产出了人与人的剥削、支配和对抗关系。

这四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批判体系,它们指向的不仅是分配不公,更是生产活动内部的结构扭曲与人类生存状态的普遍沦丧。

(二)“数字劳动”的范畴界定

“数字劳动”概念深受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莫里齐奥·拉扎拉托提出的“非物质劳动”(生产信息、知识、情感、社会关系的劳动)为其奠定了基础^[6]。随后,蒂齐亚纳·泰拉诺瓦正式提出了“数字劳动”的概念,用“免费劳动”描述互联网用户为资本创造价值却无酬的在线活动。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此基础上系统化,明确将“数字劳动”定义为数字媒体时代,用户的线上活动被资本剥削以创造价值的劳动过程。这一脉络将马克思的批判延伸至休闲、消费与日常交往领域,揭示了资本价值增殖疆域的爆炸性扩张。

借鉴既有研究及结合当前平台经济的全域渗透,本文为“数字劳动”赋予综合性过程性定义:在数字技术与平台资本主义组织架构下,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资料、

劳动对象与产品,全过程受数字化监控、量化及管理,且最终融入资本价值增殖循环的所有人类活动。需要明确的是,数字劳动范畴不限于产业链内直接活动,以“关联数字产业价值链”为准则,运输业、建筑业及农业等相关劳动,虽不直接创造数据或提供数字服务,但作为价值链运转的必要前提,同样属于广义数字劳动范畴^[7],最终服务于数字资本价值增殖循环。

二、异化的演进:数字劳动异化四维度的当代呈现

相较于马克思笔下被固定在流水线上的工人,数字劳动者似乎享有空间移动的自由与时间安排的弹性。然而,异化并未消失,而是以更复杂、更彻底的形式渗透。

(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数据商品)的异化加剧

产品的无形化与占有绝对化,数字劳动者的成果不再是棉纱、钢铁这类实体物品,而是行为、关系、内容等范畴的数据,这些数据产生之后就与劳动者分开,被平台近乎零成本地掌控,劳动者全然无法掌控,也不懂得其内容、流向跟用途,数据以反作用的形式影响劳动者:数据经算法一番加工后,会成为用以评估、监督、管束劳动者的工具,形成以自身产出为基础的循环数字化管控,“数据画像”成为悬于劳动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二)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算法管理)的异化深化

从“工头监督”到“算法黑箱”。工厂时代的监工被隐藏在代码背后的算法管理系统所取代。系统通过订单派送逻辑、路线规划、时间压力设置、动态定价等,实现了对劳动过程前所未有的精细化、实时化控制。劳动者被迫与算法赛跑,其节奏、强度乃至情绪都被系统预设和调节。“自愿的强制”与“自由的枷锁”。平台将劳动包装成“接单自由”,实则通过评分体系、奖励机制和庞大的劳动力储备池,制造了深度的不安全感与竞争压力,使得劳动者“自愿”地延长工作时间、接受苛刻条件。劳动过程的自主性幻觉之下,是更深层的被迫性与强制性。

(三)人同自己类本质(创造性潜能)的异化新态

“玩工”与劳动娱乐化,社交媒体上的创作、分享、互动等自由活动,被平台点赞、流量奖励等机制转化为商业劳动,休闲与工作边界模糊,人们休闲时也下意识生产数据,社会交往、情感表达沦为数据生产源头;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使“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8]”,这一论断在数字劳动中尤为显著,体现为技能窄化与创造力剥夺——算法将复杂劳动拆解为标准化、去技能化的

简单任务，零工劳动者长期从事此类劳动，技能日趋单一，丧失对整体性、创造性工作的掌控力与想象力，与“自由自觉的活动”渐行渐远。

（四）人同人相异化（数字社会关系）的全面渗透

原子化竞争替代了阶级团结，平台借助个体化计酬、动态排名、差评机制来转移劳资间的矛盾，把劳动者转化为原子化个体，让他们陷入订单抢夺，不易达成集体的认同，显著削弱了传统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内在逻辑；情感劳动的异化与剥削体现为，客服、主播、骑手等的社会性情感被系统性地要求、监管且实现商品化，劳动者无奈进行情感作秀，最终让真实情感变得疏离、人际关系沦为工具化。

三、剥削的隐秘化：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机制

异化根源是剥削，数字资本主义构建了更隐蔽的剩余价值获取手段：数据商品化及源泉的延伸，用户无薪资劳动所形成的数据，经算法一番处理后变成定向广告等商品，或者用于改进平台的服务，而用户却没有因数据的点击价值收获等价的回报，交往、娱乐等活动也被拽入剩余价值生产的范畴中；算法进步与相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平台利用算法提升效率、减少时间消耗、加大劳动强度，以隐蔽方式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让劳动者在剩余时间免费替平台开展工作；平台抽取佣金与

全球“数字鸿沟”剥削，平台依靠高额抽成拿走了显性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还利用诸如亚马逊的平台，依靠地域差别以低薪资雇佣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以此形成全球数字剥削的网络。

四、解放的迷思与可能：超越数字异化的路径探赜

面对数字异化，技术决定论者憧憬着“全自动化”后的普遍休闲，自由主义则寄望于个体技能的提升。然而真正的解放，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关系根本变革的诉求。

首先，破除“数字自由”的意识形态幻象。当前平台所标榜的“灵活性”、“自主创业”，实质上是市场风险、生产工具成本、社会保障全面转嫁给劳动者的结果。其次，需创新斗争形式、重建劳动者团结并推进数据与技术民主：针对数字劳动者分散、高流动的特性，可借平台工会萌芽、骑手分享“反算法”经验等探索集体行动可能，关键靠数字技术重建劳动者联结；同时要改变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探索数据公有制路径以让劳动者掌握数据及收益分配权，并推动算法透明可审计，让劳动者代表参与算法设计评估，确保技术服务人群。最后，依靠技术进步成果来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杜绝失业和过度劳累的两极化现象；强化公共服务及保障力度，让人从“为生存劳动”的情形里部分解放出来，为其自由发展创造基础条件。

结 论：

信息时代的数字劳动是资本主义劳动形式的具体表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与剩余价值学说仍是剖析数字时代剥削与压迫的有效工具。在资本主导下，数字技术延展异化时空、加剧剥削机制隐蔽性，劳动者主体性面临严峻考验。但批判旨在解放，数字时代劳动解放绝非等待技术救赎，而是围绕数据所有权、算法控制权与劳动时间支配权的政治经济斗争，需探索实践将数字技术从资本逻辑中剥离、服务社会共同利益与人全面发展的新型社会关系。尽管道路漫长，思想的穿透力与劳动者的实践智慧，终将在数字迷雾中为人类照亮通往自由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6.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2.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3-164.

[6]Lazzarato, Maurizio. Immaterial Labor[A].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C]. 1996, pp.133-147.

[7]肖峰.数字劳动的边界论析——基于马克思劳动观的考察[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4).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43.